



费孝通 著

谈民族 和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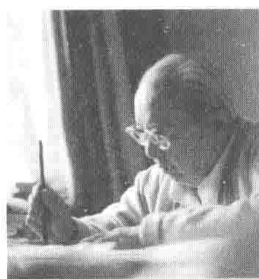
费孝通

學苑出版社

費孝通

谈民族和社会

下



费孝通 著

學苑出版社

第三编

社会学及学科建设

中国社会学的长成

——为《日本社会学会年报》写

在一个像中国一般，特别注重人伦关系的文化里，社会学，那一种以科学方法去分析社会现象的学科的发展有它的方便，但也有它的困难。方便之处是容易见到的：不但在累积的文献里充满着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规律和注解，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这套规律和注解已经成了有力的教条，我们也特别容易看到社会所施于个人的范畴力量，因而使我们很容易发生对于社会观众的注意。这在很古的时候已经如此。现代英国人类学家布朗教授 Radcliffe-Brown 曾说：功能观点的文化论有很多基本的看法和概念并不是新的，至少在中国战国时候的思想家中已经有了雏形，最重要的是荀子。可惜现在我们还没有学者能用现代的名词去把这些古书重新翻译出来，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一定有很多发现，不但在思想史上有贡献，在社会学本身也一定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譬如说，孔子所说的“祭神如神在”和法国社会学大师 Emile Durkheim 的“有人信仰上帝，上帝就存在了”的说法实在是完全相通的。中国既有着这样丰富的遗产，只要科学方法一旦传入，必然会给社会学发展上极大的方便。

但是这里却也包含着困难。中国传统对于人伦关系的重视是从实践的目的出发的。着重的是在人和人应当怎样相处，学者们所问的是为什么这样相处才算是好的问题，至于怎么会这样相处的问题却不发生的。“应当怎样”是教条，是社会范畴个人行为的方案；“为什么这样才算是好”是伦理学，也是文化里维持教条的理论工具——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科学研究的本身。科学研究的开始是在“怎么会这样”的问题上。这在中国传统的思想系统中是没有地位的。

在中国传统思想系统中没有科学研究的精神是一件事实，造成这事实的原

因之一就是在中国人太注重了人伦关系。注意人伦关系的文化必须要给维持这些关系的教条有裁制力的权威。规律的注释只限于“给予理由”的范围，是一种说教。怀疑的态度必须加以排斥，连带着被遏制的是对于社会关系的理性的研讨。怀疑是研讨的开始，研讨的结果可能是对于教条的否定，因之足以危害教条的权威。于是维持着教条下的人伦关系的确剩了习惯和感情。这对于科学是等于沙漠对于草木。以科学方法去分析社会现象的学科是不容易在这种沙漠中长成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社会学在中国的初期是舶来品，而不是从传统学术里自身演化出来的结果。

我这句话里所说的初期至少可以包括二三十年以前的时代。最早把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应该推严幾道先生，他把斯宾塞的 *Studies of Sociology* 翻译成了中文。但是他那时还没有“社会学”这个名字，这书的中文名字是《群学肄言》。群学这个名词是否比社会学一词好，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社会学一词，我想是从日本传来的，却比了群学一词更普遍的被采用了，以致现在已没有继承严先生用着他得意的翻译了。

我似乎带了一点遗憾的语气来提起这一件名词上的小事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如果有机会翻出严先生的译本来诵读时，我知道现在已经很少学生会有这心情，一定会体悉到译者想把这套洋货加以汉化的苦心。他努力地在中国旧有的思想中去寻求原有的概念来套取西洋的思想系统。我相信他大体上是成功的，因为我已说过在这方面我们确有此方便。但是他的努力却并没有传下来，至少他所用来表达这一套新学问的旧名词，却大多和“群学”一词一般的被遗失了——在教条权威没有在中国社会中消失之前，正是严先生引进“群学”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学是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生根的。社会学这个名词代替了群学，正象征着两千时期，我们为方便起见，这界限可以放在“五四”。

从严幾道先生翻译《群学肄言》起到“五四”这一段时期里，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开始，是传统教条威权的破坏时期。中间看着政治上从清朝改为民国的“革命”，和民国初年军阀的跋扈——这些都是这破坏时期的现象。在破坏过程中，传统教条被否定了，但是怎样去否定这些教条呢？批评是必需的一步骤，批评引起了研讨，这是科学的基础。“五四”初步地把破坏过程做一总结，在这里将死的还没有告终，将生的还没有降世。但是“五四”运动已确切地指出了将生的将是什么——民主和科学，那时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两位。

我说“五四”运动只指出将生的将是什么，但并没有让将生的降世成为现实，因为我觉得德先生和赛先生在那时只投了两张名片罢了。社会科学虽则没有在那时立下基础，但是各种社会科学的名词是提定了。在这些名词底下所有的内容，在性质上并没有和传统的思想有很大的出入，大多还是“教条”，大多还是“应当怎样”的主张。新的教条和旧的教条不但不同，而且是相反，相冲突。我在这里称这些新兴的理想作为教条，并不包含丝毫轻蔑的意思。这是社会变迁中必然会发生的。新的处境要求新的适应，新的适应包含抛弃旧有的生活方式，旧有生活方式有着教条的维持，因之，新的适应的第一步不免是对旧有教条的攻击。维持着旧有教条的是习惯和感情，攻击这感情对象的也就不免是更强的反感。社会运动，那种集体的行动，是转变习惯和感情的有效机缘。在“五四”运动中，人生和社会新的理想被提出了。新的理想吸引着新人物的感情，对于这些人，新理想性质上是新的教条，是信仰所维持的原则。

在那个时代，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不受人注意的。二者的区别在实质上说并不很显著，科学不能离开实用，这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疑问的；理论上的思考必须证实于自然现象的过程，因之也必然影响到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科学家并不避免他的工作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影响，他们不规避实用。所谓实用就是理想的实践。电灯实践了光明的理想，飞机实践了腾空的理想。社会科学原本没有自树例外的理由，它也必然会影响人和人的关系，也必然有实用的价值、实践社会的理想。在这方面说来社会主义，为某一种社会理想所定下的实践道路，和社会科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事实上，是互相辅助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别它们，我认为只是态度上的差别。社会主义者对于某种社会理想是视作不必考虑的前提，对这前提的态度是信仰。因之，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教条。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理想并没有成见，兴趣是在“怎么会有这种或那种理想？”社会科学是批评的，而社会主义是战斗的；社会科学对于现实是思考和解释，社会主义对于现实是改变和推动。

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虽则在人类生活的改进中应当是互相协助，但是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却可以分道扬镳。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不幸的，就这样走上了分歧的路线。中国的社会学并不是从“五四”运动中直接培养出来的，社会主义这一路才是“五四”的承继者。正因为在这方面的发展，使一部分“五四”的正统派对于富于社会革命性的实际运

动抱着歧视，多少排斥在外围，使“五四”的结果表面上只限于文学的改革。“五四”之后文学的大众化和历史的科学化汇成了一个主流，而社会主义的旁支则和当前的政治相汇合，展开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的革命运动。社会学那一门新进的科学，却在不同的偏见中被冷落地挤在荒芜的田园里。在文史的主流里因为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瓜葛而不愿加以接受，在社会主义的旁支里，却因为社会学的批评性不适宜于早期的政治运动而加以拒绝了。

我所谓荒芜的田园是在那少数和社会群众相当隔离的大学围墙之内。我相信，早年在这些大学里教社会学的并不太受人重视的。他们时常附属于其他的学系里，开讲着零星的课程，甚至他们所附属的学系都没有一定；历史、教育、政治、经济、哲学、心理，都可以作为他们的保护者。一直到现在社会学应当属于文学院还是法学院依旧是各大学随意自行取决的。

如果我们再问一问哪些大学有意收容这门被冷落的社会学？更可想见它所受歧视的程度了。社会学在 10 多年前常被视作教会学校的特色。当然，直到现在著名的国立大学中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还是没有社会学系的。

关在教室里的社会学很容易流于经院式的讨论，最能代表这类讨论的是对于影响社会现象的各种因子间孰为重要的辩论。有的主张生物遗传，有的主张后天教育，所谓文化。这类问题显然没有概然性的结论可得的，而且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无妨从某一方面入手，在实用时又免不了兼筹并顾，所以这种争论既不是因研究具体社会现象而发生的不同结论，也不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提出的不同计划，只是讲座之间相互炫耀其学识而已。我并不认为这些辩论是无益的，因为在这类辩论里至少可以把有关影响社会现象各种因子的，或是被称为“基础”的，各种学说介绍到了中国的读者面前。我说社会学在中国的初期是舶来品这句话，在这个时期大部分还是正确的。在讲座间的辩论里所应用的论据多引用西洋社会学的理论和事实。西洋社会学里的各种派别，各从它们所授的生徒，分别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学所不尽同于西洋社会学的在它们和实际社会的关系上：西洋的社会学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反映着一部分社会现实，但是当它被带进中国来时，却只剩了一套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空洞理论。这在当时讲座间的辩论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他们的互相批评到后来只成了逻辑上的责难，而不是事实上的驳证了。

这类所谓“理论”研讨实在是烦琐的。科学的理论是已有观察的总结，同时是引导和启发新的观察的假设。科学并不会发现绝对的真理，只是人和自然及人和人互相适应过程中的助力。所以理论如果不能开拓新的问题和观察的方向，这些理论在科学里是没有用处的。经院派讲座间的辩论所引起的反应是社会工作和社会理论的分家。这在大学生里表现得很深刻，做社会工作的可以不研究理论，研究理论的可以藐视社会工作。在大学的围墙之外，这分家的弊病更足令人遗憾。在民国二十年 to 民国三十年的一期中，社会实验区的设立相当多。但是这些实验只是个别的小单位和片面的社会改良工作，虽则并不若十八九世纪西洋乌托邦社会主义那样富于远大而空泛的理想，但是改良的动机出于人道观念则如出一辙。这和教会大学直接间接都有关系。教会大学本是中国社会学的温床。不能自限于经院辩论而要求实用的社会学者，在基督教义的精神中，发生了不需要理论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实验区。就是在同时附设有研究部门的实验区里，所有研究工作也只以罗列数字而不作解释的社会调查为满足。在这一个时期凡是说起社会研究的大多就指这一类的调查。这类调查自有它行政上的用处，但是如果认为是科学的则未免太切当了。我这种批评只是求全之论，如果抹煞这种工作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贡献那是不公允的。在这些实验区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初次得到了大量的社会事实的搜集和报告。这是使中国社会学向健全的大道上发展的重要步骤，我所认为遗憾的是社会理论的研讨没有配合着当时的社会改良运动罢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五四”旁支里所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那一路。民国十五到十九年的革命运动，在精神上是从“五四”运动中和政治发生直接关联的“社会主义”的旁支里发生出来的，但是这次革命依旧结束在“尚未成功”的阶段上。在一个区域里社会结构中并没有起深刻的改变，在另一个区域里却引起了大胆的和激烈的改革，在这两个区域里都没有找到怎样使中国社会主义者不能不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加以检讨了。如果在这种要求下，大学里的社会学家和政治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能共同参加这一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时，也许社会学的理论、事实和实用三者能汇合起来给中国社会学一个激发。可是，这种汇合却还没有成熟。社会主义者的检讨在动机上是康健的，但是因严守教条的前提和事实材料的缺乏，除了引起一场在青年读者中颇有影响的“社会史论战”外，并没有其他更值得称道的成绩。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中国社会学依旧分离在经院理论、实验区的调查和社会主义者教条性的实践的三条碰不上的平行线上。可是以每条线来说，经了这多年的工作积累，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进步也包括着共同的觉悟到理论、事实、实用三者应当结合的需要。这项觉悟至少在大学方面是最容易看得明白。抗战把以前门禁森严的大学疏散到了后方的乡村里，把以前可以终日和普通人民毫无接触的学者送入了破庙和农舍里，书籍的丧失和国外杂志的断绝，使他们无法在图书馆里去消磨研究的精神，再加上了国家的危急，实际问题的严重，他们无法不正视现实，把他们多年来熟习的理论，在现实的人民生活中去求证实和否定了。于是在抗战前几年已经被一部分社会学者所提出的“社会研究”，在这场合中，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的风气了。在这时期进行着实地社区研究的有三个重要研究机关：清华大学的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和华西大学的边疆研究所。

普查所的特点是在较大规模的普查工作。普查工作虽则是继承战前实验区的社会调查，但是所普查的项目却针对着中国人口、农业和劳工问题而设计的。在普查时，曾动员了当地的行政和学术人员，在昆明市和昆明附近的四县举行了中国初次挨户普查的实验。这实验奠定了来日全国性普查的方法和技术。

云大研究室在方法上和普查所是不同的。他们少数的研究员，在选定的社区中，对于某一问题做较长时期的实地观察。最早，他们的兴趣是在内地农村里的土地制度，他们想明白土地权是怎样集中的。因之，他们挑选了三个不同的乡村来观察土地权集中和其他因子，好像手工业，资本积累，家庭组织等的关系。后来他们更扩大了他们观察的范围和问题。他们在昆明的工厂里研究劳工从乡村及其他行业转入工厂的过程，又在云南的边区研究当地非汉民族的团结力，以及他们和汉人相处的问题。他们在内地乡村中也研究了基层行政机构，以及他们经济分工和贸易的方式。研究的区域虽则只限于一定的社区：乡村，部落或工厂，但是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却是中国各种及各地社区所共同遭遇的，那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因之，他们可以把不同的标本加以比较，而形成启发继续研究的假设，也就是社会学的理论。

华西的边疆研究所在方法上是近于云大研究室。他们也是在一定的小社区里进行长期和亲密的多方面汇合的观察。他们的对象是在非汉民族，在语言上

需要更长久的准备，而且对于每一部落文化的了解又需要历史的追溯。他们对于不同部落的宗教制度和土司制度的研究，都是用当地的事实来试验人类学里原有的各种理论，而且加以新的引申或修正。

这些工作如果从科学水准上估价也许并不能认为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上去检讨确可认为是一步重要的迈进。他们不是单把西洋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传统概念加以翻译，不是专注重于西洋理论的系统介绍，也不是素白的胪列中国的社会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及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地想对中国社会怎么会这样的问题提出解释。他们所提出的解释，因为观察范围的有限，很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能从可以证实的现实生活中去求概然性的解释，使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了。

无可讳言的，这些工作不过是刚粗糙的开始。他们是零星的，而且深入程度也是有限。这些批评并不改变这些工作已有的成就，只是要求这类工作的继续和扩大。可是因为这些工作的零星，他们在实用的价值上还不够显著，他们还不够作为社会设计的张本。这些工作的贫乏使社会学至今还不能在实际社会变迁里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中国现在不幸的还是在“试验，错误，再试验”的原始学习过程中去找它的出路。这过程不免浪费，而且可能走着很弯曲的道路。在我们这些相信社会科学有实用价值的人看来，如果中国社会学能早一点成熟的话，多少是可以减少一些在变迁过程中不必要的代价。我个人并不认为社会学可以代替社会主义，但是我确是相信社会学是有助于社会设计的。任何社会主义都是为了某一种社会秩序的实现而发生的，社会秩序就包括了设计的需要。

我也许未免过于自信地说，中国社会学进入了8年的战争时期，已有了重要的迈进，向着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的具体和实际化的路上的迈进。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如果真是会有成就的话，必然还得靠今后社会学者的努力；这还不够，单在大学围墙之内的努力是不够的。我已说过，需要对中国社会作现实的认识的觉悟也应当发生在直接为中国社会变迁而努力的实行家。自然科学是受了实用的要求而得到它理论上的发展，社会科学大概也不能离开这条路。

最后我觉得中国社会的成年对于人类现阶段的文化一定会有重要的贡献。

人类文化发展到这时候已逢到极严重的危机。这危机是发生在人对于自然的控制日益增加，而人对于人的控制，使人类可以利用他们支配自然的能力去增加人类幸福的能力，却并没有配合的提高，于是人所自创的伟大能力反而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是因为在过去一两个世纪中，自然科学的发达远超过了社会科学缘故。西洋的文化，至少在它现代历史期中，太偏重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忽略了人和人的关系。这一点和中国文化正相反。中国现在的困难是发生在支配自然的能力的落后，在人和人怎样和平相处的一方面，即使目前的混乱已并不能充分表现他们传统的优点，几千年的经验绝不会是一无所得的。这些经验如果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加以分析和整理，很可能用来补足现代人类文化失去平衡的缺陷。我愿意用这一个希望来结束我这一篇鸟瞰性的叙述。

1947年9月18日

原载《文讯》1947年第4期。

为社会学说几句话

关于社会学，我原本不想发表什么意见的。这个问题我很久已经不再去想它了。最近吴景超先生在《新建设》上把社会学的地位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文汇报》记者要我说几句话。

我和社会学的关系

先得交待一下，我个人和社会学的关系。我读书和教书的时候，的确一直和社会学有点关系的，但实在说来我和一批朋友却也是一直在这个牌子底下搞私货，叫它什么学也说不清楚。这私货就是少数民族、农村、市镇、工厂的社会调查。这套东西在英美的正牌的社会学家看来是行外的；一定要归个行，到近于英美的所谓社会人类学，我们现在称作民族学的那一些东西。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大学里人类学或民族学这个牌子挂不大出来，所以一直混在社会学系里。要找个说法，我们就说，我们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学。我们这些东西混在社会学里并不是为当时所有社会学界所同意的，至少并不是正统。所以我觉得一直有些搞私货的味儿，说得好听一些，是一个旁出的学派。

由于我和社会学有着这么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我对于一般所谓社会学不免是有点偏见的。要我来发表意见自不免缺乏代表性。这是我不想发表意见的原因。如果只从我个人出发来谈，我觉得社会学这个牌子取消了对我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取消之前就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我有机会去实地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一方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一方面还是可以利用我过去的训练，继续我的学术工作，

我并没有“改行”的感觉，只是觉得现在学习和研究的条件好多了。在这些工作上我一直是积极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也不再去想社会学有没有地位的问题了。在我，这个问题是解决了的。社会学这个牌子取消了，我还觉得卸去了一个包袱。

社会学问题的提法

但是，这时候把社会学的地位问题提出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呢？我觉得是好的，也是有必要的。我倒并不是因为苏联派代表出席了国际社会学会，《新时代》杂志上又提出了中国没有代表出席的话，才觉得我们该考虑一下在各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做得对，现在应当不应当恢复的问题。我是不很赞成这种态度的。我并不想再去讨论几年前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是正确的。我也并不想在社会学这个名词上来做文章。我觉得应当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上来提出这个问题。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人和人的关系。其中主要的是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又要求其他方面的各种关系产生相适应的改变。这些变化都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我们如果能掌握着这些客观规律，那么改造起来就顺利些；如果摸不清这些规律，我们就会吃亏。这里就有学问，也就有科学。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那是有了基础的。其他许多关系的研究我看还都没有很好的建立或发展起来。这话说来，就牵连得多了。我也没有考虑成熟，如果作为一般讨论，我不妨说说我的意见。比如我最近调查了一些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我意识到这里有一门很复杂的学问，那就是怎样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这问题可以包括更多的内容，好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等等，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的新问题，是在阶级消灭后人和人的政治关系问题。把这些关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来研究它的变化和运动的规律不是一门新的学问么？如果要挂个牌子，我想也可以说是政治学。

我这两年来又调查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其中有一方面是属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那是新的政治关系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和变化，如果专门加以研究，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我想又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极有意义的部分。另一方

面，我又看到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的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是处理得不免太简单化了些，而且的确出了一些问题的。其实，这又是一门学问，我想就是行政学或管理学。

上面所说的那些问题，现在尽管没有进入学府来进行研究，在党派和政府机关里是有调查研究的。但是还有些人和人关系的研究却落了空。比如两性关系罢。这是存在于人和人之间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但是认真地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重要部门来加以调查研究却就很少了。现在不论是哪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等都有一大堆，而且大家总是觉得最头痛，甚至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妥当的。社会进步得这样快，这些方面都需要建立起和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关系，而新旧交替之际，出现些混乱现象是难免的。不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进行调查研究，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当的解决，使得许多人生活不安定，思想波动，甚至违法乱纪，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

再举个例子：最近很多人注意了人口问题。这个问题不论怎样说法总是存在的。过去却因为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大家都不敢再提这个问题了，好像谁一提这个问题就该批判似的。实在说来，好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正可以否定马尔萨斯的理论，而建立起我们的正确观点来。大家不敢谈，并没有取消这个问题；以致一松口，就出现了“吃蝌蚪”的不科学的宣传。我并不怪宣传吃蝌蚪的人，更不怪吃蝌蚪的人，而要怪阻碍研究人口问题的人。

在这里我不想罗列出一大堆问题来，只想指出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无事的。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如果我这样说法是对的，自然要问，谁来研究，由党派和政府的干部拿出一部分力量来研究好呢，还是搞一批人出来专门做这些工作好呢？我想是专业来搞应当好些。搞得出一套学问来么？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它的变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来，不就是学问么？至于这些科学称什么名称，那倒无关宏旨。如果大家觉得社会学三个字不讨厌，用这三个字也要得。如果很多人看了不舒服，想出个顺眼些的名字来，当然也好。

也许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些是否够得上称什么学，我想也不必在这个字上引起争执。如果大家承认这些问题有必要系统地调查一番，那就第一步先搞调查，称作“社会调查”也可以。我想反对“社会调查”的人理由是不会太多的。

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员

有没有会搞社会调查的人呢？我认为是有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以前在各大学里教社会学和学社会学的人。他们过去搞过这套调查工作，立场、观点、方法固然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这些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改造的。他们原来学会的那些访问、观察、记录、统计、分析等技术还是有用的，而且他们多少也了解过旧社会里的社会情况以及当时的问题，调查起现在新旧交替的情况时，还有很多知识大有用处。如果要搞这些工作，我愿意保举这一批人员。

取消了社会学系之后，这批人哪里去了呢？现在怎样了呢？我所知道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很得其所哉的，在新岗位上搞得蛮起劲，要他们回老行是做不到的。我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那些有了新的岗位工作的，也能胜任，但是心里还不忘旧好，有机会再继续搞老行是乐意的。第三类是一直没有安定的，我就知道有一位老教授，院系调整后，一连改了三次课程，改得他三日京兆，无所适从。我知道有些没有开课，学了俄文在搞翻译工作的。我也知道还有在政府参事室里，除学习之外，没有什么事做的。他们如果能回到老行来，那真可以帮助解决些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问题，这些人的潜力这样是可以发挥的。第三类的人并不是个别的。总的看来，这项工作不是没人。

有事也有人，但还缺一条，就是要个组织，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如果承认这些也是科学研究，那就应该安在科学院里，能成立个社会学研究所那是最好了。如果觉得社会学这个名称不体面，不妨称社会调查所。说起来，社会调查所是有过历史的。现在北京文津街科学院办公室的建筑原来有一半就属于过去的社会调查所的。那个社会调查所的所长陶孟和先生，现在就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其中不无瓜葛可缘。话暂且说到这里，声明一下，我原来已不再想这个问题了。这段话是被人勾出来的，考虑得是不够成熟的。

1957年2月12日

原载《文汇报》，标题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

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于它的任务

关于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的问题我还没有很成熟的意见，只能提出一些看法，作为参考。

我觉得一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应当决定于它的任务，一门学科的任务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里提出来的。在规定某一个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时，还需要明确和其他学科的分工和它的独特园地。

从这个看法出发来考虑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就必须看一看我们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哪些问题？哪些学科还没有进行研究？这些问题属于什么性质？和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有没有区别？

最近几次讨论中，已经提出了许多应当进行而现在还没有研究的当前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人口问题，家庭问题，城市服务问题，以及犯罪问题等等。因此可以肯定社会学是有对象可以研究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发掘出来，做一个系统的归类，而且对于每个问题的内容也没有系统的摸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全面的规定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还没有条件。我们是不是必须先把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弄清楚了，再动手工作呢？我想是不必要的，不妨采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逐步开展的方法，等一个时候再来系统化。

我同意很多先生所说的，过去社会学并没有一个共同接受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所谓社会学理论系统。但是，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而绝大部分研究者的立场是站在资产阶级这一面，想通过他们的研究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这是主要的一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然也存在革命的社会学，那就是“马列主义社会学”，但是由于“社会学”这个名词已经被资产阶级所占有，排斥了革

命的社会学，革命的社会学也有不愿用这个名词，以免混淆立场。所以，一谈到社会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学。

资产阶级社会学是反动的，因为它服务于剥削阶级，反对革命。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样的学科是不能容许它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我们解放后取消了这门学科的讲坛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也存在社会问题呢？那是应当肯定的，既然存在就应当有个学科去研究它们。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有它自己的社会学。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建立这个新的社会学。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问题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是消灭了，生产关系是改变了，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各种矛盾，形成了种种社会问题。在一定时期里还存在着过去阶级社会余下来的本质上还是阶级矛盾的问题，而且也存在着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情况是很复杂的。

从表面上看，我们现在还存在着的人口问题，家庭问题等等是在旧社会中已经有过的问题，但是本质是有了变化。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个变化，从而认为旧社会学的一套可以用来研究这些新问题，我们是会犯错误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恢复社会学”的提法是可以考虑的。也因此，我们过早的成立社会学系也是不相宜的，我们还需要一个时间来摸索新的社会学的内容和做法。

另一方面，我们能不能说过去并没有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社会学呢？我想不能这样说。我同意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新的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社会学可以说已经有了基础。那么是不是不必再成立一门以“社会学”为名的学科呢？那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我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社会学的基础，它同时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有了基础并不等于就有了房子。历史唯物主义教程里不可能包括许多社会问题的具体分析，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也决不能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因此，我看，新社会学的内容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上，和指导下，来进行具体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从而累积对这方面的知识把它系统化，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

再一方面，我们是不是要和旧社会学割断关系呢？我认为要割断的是贯串在旧社会学里的反动立场和反动理论系统。在立场上不分清是决不可以的。但